

大师忆大师 回忆 陈寅恪先生

文\季羨林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 65 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 1930 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陈大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 1945 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美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的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1946 年的深秋，我辗转回到了阔别 12 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到处是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在三年之内，我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寅恪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 2000 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可见一斑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节选自《季羨林谈师友》季羨林研究所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晚年的陈寅恪
双目失明，但他永远睁大眼睛，仿佛仍然目光如炬。

在刚刚故去的国学大师季羨林眼中，清华大学导师陈寅恪教授，是影响了他一生的关键性人物。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

而未曾与寅恪先生谋面的中大海南籍学生谭志龙，也为大师的学养与人格魅力所折服，深受教育和影响。大师风范，值得后辈敬仰与追随。



一九四七年的陈寅恪（左）与王力教授

学子忆大师 我未曾谋面的 老师陈寅恪

文\谭志龙

陈寅恪教授是我的老师。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年起，我就知道他。虽然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我一直在追寻他的踪迹，在精神上接受他的教育和影响。

“国宝”教授 钟爱中大

我是 1957 年秋季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与我同班的张树英同学（生前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原本是历史系 1956 级学生，读了一年后才转到中文系里来。他经常在班中讲他在历史系一年中的见闻和感受。言谈中，经常讲起陈寅恪教授来。他说，1957 年春节，他同几位同学到陈教授家拜年。大家坐定后，陈老师便问他们：“你们中有谁第一志愿是报北大历史系的？”在座的同学中，有人回答，他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才是中大。陈老师便说，北大历史系很好，但中大历史系也很不错。我就爱中大，爱中大的校园，爱南方的天气。有人动员我到北京教书，我都舍不得离开这里……话语中流露出他对中大的深情钟爱。

张树英同学一讲起陈寅恪教授来便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显然，他以自己能听过陈老师的授课而感到幸福和骄傲。他说，陈老师是“国宝”级教授。他学识渊博，除汉语外，他还掌握其他语言文字达 16 种之多。他对学生讲《佛经翻译经》时，能用 14 种外语进行对比讲授。他博闻强志，记忆力强得惊人。他 56 岁时，双目失明，不能查找资料，但他凭着记忆，能说出某某资料在某书某页某行，他的助手去查找，果然丝毫不爽，助手们都惊叹不已。他的才学与其的勤奋攻读分不开。他 38 岁才结婚，结婚前，他已蜚声中外，被学术界誉为“教授的教授”。此时，他仍每周用两天时间到城里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好学令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张树英多次的侃侃而谈，逐渐在我们心中构筑起陈老师高大的形象。我们多想同陈老师见上一面啊。大学毕业前夕，我邀请张树英带我去碰碰运气。我们中文系学生住在学校西区，他带我穿过中区的主校道到东区去。处在学校中轴线上的是“怀士堂”（中大小礼堂）。陈老师的故居在怀士堂东侧，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楼后有一条白色小路，那是陈老师经常散步的地方。我们沿着小路徘徊着，屏住气，放轻脚步，唯恐惊动了里面住着的世界级学术大师。走了几个来回，“奇迹”并未出现，我俩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悻悻离开……

记忆超卓 名闻遐迩

陈寅恪教授生前身后都有许多传闻。与他同校任教多年的黄天骥教授（中大研究生院院长、博导）笔下就有不少生动的记叙。

2004 年，黄天骥教授撰写的《中大往事》一书问世。我赶忙去书店购买。读完全书，我惊喜地发现，作为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在书中也有多处被提到，而且在页旁边的插图中，我得以瞻仰陈老师的遗容，以偿我几十年前想探望他而终不可得的愿望。

“陈教授双目失明，听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而且记忆力惊人。他不能看书了，在研究和备课时，需要核对资料，便告诉助手，所需材料在某书、某页、某行。助手‘按图索骥’，百无一失。”几十年前张树英的口述，几十年后黄教授的笔录，不约而同，前后印证，陈老师学识渊博的光辉形象牢牢地在我面前矗立了起来。

“传说中说苏会谈时，斯大林会见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及陈寅恪。”陈教授名闻遐迩，说他是世界级学术大师，实不为过。

“传说当年中、苏交恶，有关部门为了证实珍宝岛是我国领土，便派人向陈教授请教。他当即凭着超卓的记忆，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陈老师也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以特殊的方式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大师殒落 丰碑永矗

“文革”期间，陈教授饱受摧残，还不慎摔断腿骨，郁郁而终。据老校工们说，陈教授去世的那天，校园里一颗大树，无缘无故地倒了。这些事，也许是巧合，也许属讹传。但从中可以窥见师生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大学者的景仰。是一棵大树倒了，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殒落了。

“1950 年学生们送给陈老师的一面锦旗，上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给予他至高无尚的评价。”也充分表达了同学们对陈老师的崇拜、敬仰之情。我的同班好友张树英虽已于去年作古，但他和其他师友用语言文字雕塑的陈寅恪教授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我心中！

作者为《海南教育》杂志社原总编辑，现退休